

20世纪90年代党史国史领域文化研究述略

孙 丹

〔摘要〕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需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指导，还必须有与社会层面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思想层面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与建构。20世纪90年代，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党史国史领域的文化研究在占有大量新出版档案文献的基础上，开始在专题史意义上进行突破，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领袖人物的文化思想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为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思想资源，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党史国史；新民主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图分类号〕D232；K2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1798(2017)-02-0021-06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时期，迫切要求文化建设与之相适应，以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中共中央创造性地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化建设自然而然地向历史寻求有益经验和思想资源，探索新形势下文化发展的新实践、新特点。

党史国史学界出现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将整体历史观融入研究当中，从对事件和问题的单向度微观研究为主转向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立体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将微观研究置于大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得到应用，推动了研究水平的快速提升。文化研究在既有政治史视角的基础上，着力挖掘文化本身的规律和经验，取得了重要收获。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和理论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是对中国从晚清、五四运动以来中西文化论战的科学总结。在观察和分析20世纪上半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和世情基础上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文化的理论探

索和经验总结。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文化决定并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新中国成立后，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为社会主义文化，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处理文化问题和文化建设的原则和方针，对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更具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专题研究开始增多。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篇名关键词检索，1990—1999年的十年间，中国知网共收录24篇相关文章。这些文章研究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重要内涵、历史意义，特别是集中探讨其现实价值。有作者认为，20世纪40年代初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是近代社会百年间先进的中国人对民族文化出路问题所作的最科学、最有价值的探索。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新民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主义文化观有丰富的时代内涵；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它是一种科学的文化模式；从现实的角度看，它通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理论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现代价值。也有作者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纲领，在坚持和继承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突出时代特色，并赋予新时期的时代内涵。

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发展，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和实践也日益成熟。199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概念，并初步阐述其主要内容和主要观点。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在强调“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注意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将文化问题单列出来，在第四部分“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从六个方面比较全面地对文化事业的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这就把此前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但更强调思想道德建设即更强调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调整为两个方面并重。

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在作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正确判断后，进一步突出文化建设的重要地位。在第七部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对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作了说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同时明确阐释了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我国文化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这是继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后党在正式文件中对社会主义文化问题的集中表述，表明共产党人传承中华文化和广纳人类文明的文化胸襟。自此以后，文化建设成为党的代表大会报告和有关决议的重要内容，并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这一时期，文化理论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概念的确立。在承认文化具有商品属性、市场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基础上，党在文化理论、文化政策、文化管理上，突破过去只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的认识框架，明确文化兼有意识形态和商品的双重属性，以及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是文化不同的建设和发展层次，从而厘清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差别。

文化产业形态虽然自古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产业概念却是在国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确立的。西方文化产业兴起于20世纪中期，因其产业链长，投入产出高，被誉为新兴的无烟工业，到七八十年代以后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而此时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文化市场方兴未艾，理论界、学术界对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一直争论不休，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困扰着文化管理者和从业者，提出多年的文化体制改革问题也难以推进和深入。1986年中国正式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国地位的申请，并开始艰苦的“复关”谈判，其中的重点和难点正是文化产业问题。在国内被视为非经济的文化事业，在国际惯例中大多定义为“产业”，

张艳国：《再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刘慧君、廖健太：《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纲领》，《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S5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73页。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5页。

被要求纳入到对外开放目录中。因此，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要求在理论上明确界定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和属性。1992年，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在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时，首次在政府文件中明确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1998年，文化部增设文化产业司，在实践层面确认文化产业的市场主体地位。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将“文化产业”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化产业，终结了持续十余年的论争。

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是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的新经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一方面突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不能放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建设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国际上发生苏东剧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和政治孤立，中国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严重危机。1992年1—2月，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巨大争议和困惑的市场经济问题，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同时强调指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

中共十四大提出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此后，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到进行了深入探索。199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在讲话中要求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针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思想领域混乱、文艺创作中的种种问题，提出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宣传思想战线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

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强调“团结鼓劲，正面引导，不搞‘大批判’，不搞无谓争论”。但是，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要旗帜鲜明，理直气壮，毫不含糊”。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规划未来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建议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总体规划，指出，没有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进步，物质文明建设就没有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经济发展目标就难以实现；必须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此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把精神文明建设正式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议题，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精神文明建设进行理论探索和全面部署，并首次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进行部署。与1986年的第一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相比，两个决议都强调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第一个决议强调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体现了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初期基于经济建设为中心、文化建设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要求；第二个决议进一步提出精神文明建设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把精神文明建设放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考察，赋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更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为研究的热点，特别是《决议》发表以后，学术界迅即掀起阐释和研究的热潮，涵盖党史国史及各个相关学科。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篇名关键词检索，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8页。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85—1486页。

1990—1999年的十年间，中国知网共收录相关文章近2000篇，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内涵、建设途径、历史发展过程、理论和现实意义、长远影响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四、党的领袖人物文化思想研究

党的领袖人物文化思想研究，覆盖面比较广泛，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在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对新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其文化思想也始终是学术研究的热点。20世纪90年代，随着历史档案资料的大量披露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陈晋关于毛泽东的系列著作从文化的维度全面解析了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文化思想和文化内涵，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的新高度。

20世纪90年代前期，学术界主要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批评标准、文艺的大众化等专题进行研究，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争鸣。如《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集刊第六辑，收录了1990年“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纪念会暨学术讨论会”入会论文，其中多篇论文对否定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审美本性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后期扩展为毛泽东文化思想研究，阐述毛泽东有关文化的本质及经济、政治、文化三者的关系，文化的人民取向，文化工作的“双百”方针，对待古今中外文化十二字方针的论述为核心的文化思想，为当时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点与支撑。

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理论也是研究的热点。分析者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研究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特点的基本认识、思想改造的内容方法途径等，认为毛泽东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上尽管存在失误之处，但这一理论及其实践的主导方面并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通过江泽民和邓小平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党的知识分子思想和实践。

邓小平的文化思想是其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邓小平

文化思想是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继承，又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实现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邓小平早在第二次复出的各项整顿中，就对文艺工作进行了调整，使一些被错误批判的作品得到解放。“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首先着手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在第四次文代会上发表划时代的讲话，重申文化建设的“双百方针”。此后，把文化艺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发展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把文艺服从和围绕“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展为服从与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邓小平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两个方面。有研究者指出，邓小平文化思想体系中关于文化工作的指导方针，就在于三个“必须”和三个“不允许”，即“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允许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邢贵思：《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3期；林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吴雄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灵魂——兼论分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高校理论战线》1996年第11期；王庆五：《思想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支柱》，《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6期；齐广本：《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浅议》，《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3期；林浣芬、林鲁文：《建国头七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初步建立》，《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3期；王立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历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王体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及其重大意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等等。

主要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之魂》（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编：《实践、思考与追求——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六），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允许毒害人民、污染社会和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泛滥；必须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不允许搞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在科学文化建设中，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及其战略地位。可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既强调了文化的政治功能，又强调文化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多次对文化建设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首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的提出，充分表明党在文化问题上的世界视野和文化思想的新高度。这一时期，关于江泽民文化思想的研究也迅速展开。研究者认为，江泽民的文化思想是邓小平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内容概括地说就是举旗和创新。他对邓小平理论包括邓小平的文化思想进行系统的论述，并从社会主义文化的政治内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纲领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文化思想，把党的文化思想提高到新的水平。

五、知识分子问题

知识分子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得到加强。中共十二大把教育列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十三大更明确地提出培养人才是实现“四化”的关键问题。20世纪80年代，贯彻执行一系列提高知识分子待遇、改善生活条件的政策，全面启动科技体制改革，基本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和政策环境。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面向科技主战场的科技体制改革加速推进，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空前凸显。这一时期，对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和党的领导人的知识分子思想研究广泛开展起来，既有历史纵深，又关注现实，成果丰硕。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知识分子工作争议最少、最具共识的一段历史。总体来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适应了知识分子重新学习、转变思想、提高认识的需要，有利于促进知识分子以新的精神面貌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中去，但运动后期的一些做法，为此后愈演愈烈，对知识分子造成巨大冲击的一系列运动埋设了隐患。作为新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的源头，这段历史吸引了众多研究者进行多角度的阐释，并扩展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性格与命运等纵深研究。

周恩来不仅是党制定知识分子政策的主要参与者，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党的领导人，而且以其人格魅力凝聚了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并与他们终生保持密切联系。周恩来的知识分子思想及文献、在关于知识分子的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用等也是研

冯达才：《“邓小平文化思想与经济文化研讨会”论点述要》，《现代哲学》1995年第2期。

肖贵清、刘仓：《邓小平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发展》，《党史博采》1998年第9期。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8、33页。

王建辉：《江泽民文化思想初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刘健清、刘庆楚：《试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5期；李泓：《试述合江解放初期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佳木斯师专学报》1996年第2期；张瑞敏：《论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形成》，《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谢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始末》，《党的文献》1997年第5期；刘晓清：《五十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心理变迁及原因》，《浙江学刊》1998年第5期；朱地：《对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历史考察——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观点》，《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5期；金建明：《解放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世纪行》1999年第12期；应红：《邵燕祥：精神与人格的重构——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轨迹的对话》，《青年文学》1999年第3期。

研究的热点，出现了不少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间，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经历曲折发展，既取得了重要成绩，也有失误之处，既对知识分子当事人及其家庭造成冲击，也使社会上普通民众对知识、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教育工作的认知产生极大偏差甚至扭曲。知识分子问题的话题持续不衰，不少人撰写回忆文章和回忆录，一些知名知识分子的书信、日记及其传记得以出版。在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中，逐步触及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层次问题，也形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将当代知识分子群体出现的种种不良问题甚至社会问题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引发一些争论。对此，党史国史研究者既要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也要关注和警惕所谓“公知”背后的经济乃至政治利益诉求。

六、几点思考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需要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指导，还必须有社会层面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和思想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与建构。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革，需要从观念层面、哲学层面、文化层面进行理论阐释和总结。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文化对经济发展、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促进作用越来越突出，党史国史领域文化研究得到空前的关注，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成果不断增加。但也存在着对社会文化的关注和研究不够，存在着理论建设前瞻性不足、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脱节、宏观性与微观性研究各有缺失等问题。这直接或间接派生出新世纪以来文化阐释缺乏历史根基、历史阐释泛文化和戏谑化、主流文化与社会文化整合困难等问题。

文化是经济政治制度的产物，并反映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变迁。文化一经形成，就会或深或浅、或隐或显地影响和制约经济政治的走向。因此，党史国史领域的文化研究一方面要避免抽象空洞地分析文化问题，而要把文化问题置放于党史国史发展的大背景中，追寻文化思想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深层动因，研究社会文化状况如何影响党的文化思想理论和政策，以及党的文化思想理论和政策又怎样引导和塑造社会文化生态。另一

方面，在党史国史的研究中植入文化的视角和维度，挖掘经济社会发展中文化所发挥的深层力量，并随着时代的发展来总结党领导的文化建设为民族文化注入的新元素、新活力，推动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和发展进步。

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是学界对新的研究方法的热衷。作为研究工作的手段和工具，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新方法的确能够开阔视野，成为破解瓶颈、推动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推动力。20世纪90年代党史国史研究，特别是国史研究，正是借助新的研究方法开创了研究的新局面。以往的党史国史研究，重点领域往往集中在经济、政治、外交。这一时期，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甚至更细小的人口史、家庭史、城镇史等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并取得成果。而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得益于对新研究方法的借鉴。学科交叉、系统思想，以及数理统计等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多维视角，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进步与推广，为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和可操作性，使党史国史研究呈现出新面貌。就文化研究而言，文化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无疑会拓展和深化党史国史研究：不仅能够丰富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也为破解和阐释党史国史领域一些难点问题提供新思路。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副研究员 北京 100009)

许静：《周恩来在建国后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思想》，《求实》1991年第1期；廖心文：《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纠“左”的艰辛路程》，《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4期；许原植：《周恩来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贡献》，《福建学刊》1994年第4期；龚育之：《周恩来和建国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李庚全：《周恩来知识分子思想的形成和实践探析》，《理论探讨》1998年第4期；李晓红：《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邓方国：《重温周恩来的〈论知识分子问题〉》，《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